

《儒林外史》词汇研究

遇笑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词汇研究/遇笑容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

ISBN 7-301-00900-3

I. 儒 … II. 遇 … III. 儒林外史-文学语言-文学研究
IV. 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201 号

书 名:《儒林外史》词汇研究

著作责任者:遇笑容

责任编辑:徐 刚

标准书号:ISBN 7-301-00900-3/H · 107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8

电子信箱:z 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148 毫米×210 毫米 A5 开本 5.5 印张 148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00 元

PREFA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for which Yu Hsiao-jung has alread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became an important domain in Chinese linguistics.

Nevertheless, studies on historical lexicon and semantics a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There is no doubt, however, that they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as semantic change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are now viewed as the most crucial pre-conditions of or motivations for syntactic change, together with subject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This is to say that this book is of first importance. It is indeed one of the firs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in a very comprehensive manner semantic change in Chinese, following the only work already done by Prof. Jiang Shaoyu.

In tackling semantic change, Yu Hsiao-jung has an original approach. Instead of writing a general analysis, which will necessarily be limited and full of unverifiable generalizations, she chooses to focus on one book only, the *Rulin waishi*, one of the two major novels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whose linguistic importance is recognized by all specialists of Old vernacular Chinese.

In doing so, she is able to provide a very detailed study of the lexical structures of the 18th century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to shed ligh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xicon and on semantic change.

Her study of the lexical behavior revealed in the novel is based on a wide range of lexical items, about 800 of them, selected from

5,000, which have been subject of a dialectal analysis. She first makes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frequency and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m, and then conducts interviews of a large number of informants of Quanjiao and Nanjing dialects, areas where the author lived from the age of 32 until he died at the age of 54. The data have also been reviewed by more than thirty informants representing all major Chinese dialectal groups.

The linguistic data collected in the study are the most complete and the richest we have. No one has done similar work on any vernacular novel. It provides very solid inform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Yu Hsiao-jung does not content herself in providing all the necessary data. In emphasizing frequ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words, she uses methods of statistical calculations that provide substantive and reliable results. Such quantitative studies are quite few in our field,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Prof. Yu's methodology will have an influence on future studies.

One of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Yu Hsiao-jung is that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novel show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uanjiao dialect. This conclusion is not based on isolate items but grounded on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lexicon.

Apart from an obviou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nguistics, Yu Hsiao-jung solved literary problems, especially questions of authorship and dating. Along the lines of some works of Prof. Mei Tsulin on dating literary works by using linguistic criteria, she confirms her previous study (appeared i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at the first twenty-two chapters of the novel show features of Old Mandarin and Quanjiao dialect while the remaining twenty-three chapters include features of dialects other than Quanjiao. The two parts of the book are therefore written possibly by different authors.

This book is undoubtedly a pioneer work, and I am convinced it will b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be followed by similar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the lexicon and the semantics of Old vernacular Chinese novels.

Alain Peyraube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Professor at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Deputy Director in the Divis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CNRS

目 录

第一章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1)
1. 1 吴敬梓的生平和家世	(1)
1. 2 《儒林外史》成书的背景与时间	(3)
1. 3 《儒林外史》语言的方言色彩	(5)
第二章 《儒林外史》词汇系统的方言色彩(上)：调查方法	(9)
2. 1 问题的回顾：明清小说的作者和方言	(9)
2. 2 从词汇系统看作品语言的方言色彩：思考与设想	(15)
2. 3 《儒林外史》词汇系统方言色彩的调查框架.....	(18)
2. 4 对所用方法的一点再思考.....	(23)
第三章 《儒林外史》词汇系统的方言色彩(下)：调查结果	(27)
3. 0 导言	(27)
3. 1 全椒方言使用的词语.....	(27)
3. 2 江淮方言使用的词语.....	(35)
3. 3 江淮与其它方言共用的词语.....	(49)
3. 4 全椒方言不用的词语.....	(77)
3. 5 从调查结果看《儒林外史》词汇的方言特征	(79)
第四章 从词汇的使用看《儒林外史》的作者问题	(82)
4. 1 问题的回顾：从语言看文献的创作时代和作者	(82)
4. 2 《儒林外史》中一般词语的分布差异.....	(91)
4. 3 《儒林外史》中虚词和一些语法格式的分布差异	

.....	(103)
4.4 词汇使用的差异显示出《儒林外史》前后的作者不同 (108)
第五章 简短的小结 (111)
附录：《儒林外史》词语例释 (115)
主要参考文献 (154)
后记 (160)

第一章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1.1 吴敬梓的生平和家世

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生于 1701 年，卒于 1754 年，在世五十四年。吴敬梓以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显著地位。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随着《儒林外史》研究的兴起和深入，对吴敬梓生平和家世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从 1922 年胡适先生撰写《吴敬梓年谱》到现在，众多的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多年广泛搜集资料，详加考证之后，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勾画出吴敬梓一生的概况。

吴敬梓生长在安徽全椒，其祖上是自江宁六合迁来的。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述其家世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轫于东浙。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部。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①其曾叔祖父吴国龙的墓表也说：“先是居制东瓯，高祖聪迁江宁之六合，又迁全椒，遂为全椒人。”^②吴家从转弟起由江宁六合迁居全椒，以后吴谦、吴沛、吴国对、吴旦、吴霖起、再到吴敬梓，前后历经七代，可称是世居全椒。如《移家赋》所说，吴敬梓的祖上“有明靖难，用宣力于南部”，大约曾建立过一些军功，得到过“千户”的官爵。但到全椒之后，吴家已是一般百姓，以农耕为业。后来又转而行医，悬壶救世。两三代之后，到了高祖吴沛开始读书有成，成了一名廪生，从此吴家代代有人读书科举，家世慢慢显赫起来。吴沛生了五个儿子，五子之中四人中进士，其中包括吴敬梓的曾祖父吴国对和吴国对的孪生兄弟吴国龙。吴国对是吴家四进士中的佼佼者，不但中了进士，而且是探花及第，就职于翰林院。孪生兄弟吴国对、吴国龙同为进士，但子嗣却命运大异。吴国龙有两个儿子，先后中进士，其中一位还是榜眼，以后两人在朝廷都身居要职。吴国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吴旦，这仅有的一子，很年轻时就去世了，死时仅是一名增监生而已。增监

生吴旦是吴敬梓的祖父，从祖父吴旦这一代起，到嗣父吴霖起，再到吴敬梓，吴敬梓家在吴氏家族中一直是比较没落的一枝。

吴旦虽然因为早逝而没有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其孝行和乐于行善，在全椒一带是很为人称道的，甚至在全椒县志上都有所记载。吴旦也仅育有一子，就是吴霖起。吴霖起和父亲一样，在宦途上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他只是一个拔贡，终其一生，只在江北当过赣榆县教谕，做了九年。后来因其为人耿直不被上司见容而罢官回家，以后闲居全椒，郁郁而终。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嗣父。吴敬梓的生父叫吴霖延，对吴霖延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一直居住在全椒一带，在吴敬梓二十岁前后，就去世了。因吴霖起没有子嗣，吴敬梓自幼就为吴霖起收养，以后也一直随他生活，直到他去世。

吴敬梓生在全椒，在全椒襄河北岸河弯街其曾祖父吴国对故宅“探花第”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十四岁时，嗣父吴霖起就任赣榆县教谕，吴敬梓随父前往赣榆。十四岁到十八岁，有人认为他随父常住赣榆，有人认为他以住在全椒为主。十八岁以后，他忙于料理家事，在全椒结婚取妻，加之生父身体不好，常常往返于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吴霖起罢官回家，吴敬梓也随父再回全椒定居。以后，在二十三岁到三十三岁的十年里，吴敬梓除了在江淮各地出游访友外，几乎都是在全椒度过的。三十三岁时，吴敬梓变卖了祖产，迁家南京。最后在五十四岁外出访友之际，不幸病故于扬州。

和他的祖、父一样，吴敬梓一生坎坷，多遭变故。他十四岁时丧母，青年时丧妻。二十岁左右，嗣父、生父先后逝去。两位父亲去世之后，族人和他发生家产纷争，最后他只好携带续娶的妻子，变产迁居，举家移居南京。客居南京后，家财耗尽，多次生活窘困，不得不靠朋友资助度日。在科场中也失意潦倒。幼年时，嗣父吴霖起很希望他能继承先人的遗业，经科举而入仕途，重振家风，为此不仅给他找了最好的老师，而且还亲自督促他读书，研习八股文。但是，吴敬梓却是功名蹭蹬，久困屋场。终其一生，吴敬梓只在十八岁或二十二岁时中过一次秀才，以后虽几次参加科考，但均未考中，一生没有找到机会出仕。

1.2 《儒林外史》成书的背景与时间

坎坷困顿的人生，曾经显赫的家世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基本条件。

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描写“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微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③曾经家门显赫却一生困顿的吴敬梓，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他的亲朋故旧中不乏身居高位，官场得意者；父辈自幼培育，以科举功名为立身之道，从二十岁前后得一秀才之后，虽多次赴考，却屡遭失败，耳濡目染的都是在功名之路上奋力搏击的读书人的众生相；长年往返于大江南北，“幼即聪颖，稍长……诗赋援笔立成”^④，以后又广交朋友，身为文坛领袖，吴敬梓的身边自然会集了一批失意于功名或无意于功名的学者、文人、诗人、画家；移居南京后，家产耗尽，几至于绝粮，只能在家“闭门种菜，皆佣保杂作”^⑤，穷困中的吴敬梓，又有了一番与市井小民交往的经历。生活的经历在吴敬梓面前展开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画卷，而这一画卷中对吴敬梓来说最生动、最细致入微的，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百态。当求取功名无路，饱尝世态炎凉之后，冷眼观世的吴敬梓写下了这部“《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⑥的长篇讽刺小说。

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时间，许多学者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A)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书前有闲斋老人乾隆元年（1736年）序，故认为书应在1735年已经写成。^⑦

B) 胡适在《吴敬梓年谱》中，因书中许多事发生在乾隆元年之后，推论成书时间在1740——1750年之间。^⑧

C) 何满子在《论儒林外史》中提出，第28回是分界线，1736年前完成了前28回，29回以后的部分，写作年代不会早于1736年。^⑨

D) 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提出一些较为精确的意见，认为前25回作于1735年秋后到1736年二月之前；26至35

回作于 1736 到 1739 年；36 回以后，是吴敬梓 1754 年逝世之前完成的。^⑩

E) 孟醒仁《关于儒林外史创作时间的几个问题》认为，吴敬梓三十三岁（1733 年）开始写，1736 年前完成了不少于 20 回，已经可以独立成书了，所以会有乾隆元年（1736 年）的序，其余部分完成于 1736—1748 年。^⑪

以上几种意见虽然在细节上有种种差异，但是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吴敬梓写《儒林外史》是在 1735 年前后；而大部分人认为，《儒林外史》前后有所不同。前后差别，又有两分法和三分法之别：何满子和孟醒仁两分，只是何分在第 28 回，孟分在第 20 回以后。谈凤梁主张三分，前 25 回一部分，26 至 35 回一部分，36 回以后又是一部分。

从吴敬梓的身世看，主张吴写作《儒林外史》的时间在 1735 年前后，是可信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⑫作者要反映、刻画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没有一番复杂的生活经历，没有一番痛苦深刻的生活磨难是无法做到的。这正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家庭的变故，给他提供了更深刻、广泛的生活背景，使他能够接触到社会的个个层面、和生活在不同层面上的各色人群。现实生活中的感悟，使他对社会、对生活有了“切肤”的体验，有了创作的动力和素材，由此才造就了曹雪芹，才产生了不朽的名作《红楼梦》。吴敬梓要在笔下创作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要描绘他们在不同境遇下的生活百态，也同样需要有一番广泛的生活经历，看到他们、接触他们、了解他们，然后才能在作品中再现他们。1734 年吴敬梓迁居南京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从 20 岁左右中秀才以后，多年参加科考，但屡战屡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希望大概已经破灭。变卖祖业，不见容于族人，迁居南京，又不善于治产，沦落到不时需要友人救助的境地。此时的吴敬梓有的只是他半生艰辛的阅历，他眼观、耳闻而来的众生态，他脱离了名缰利索和族人的窥觎争夺之后的辛酸感触与鄙夷蔑

视。他的记忆中是丰富的创作素材，心中是无法宣泄的复杂情感，大概也正是这个时候，吴敬梓拿起笔来，创作了《儒林外史》。

1.3 《儒林外史》语言的方言色彩

如果 1735 年前后吴敬梓创作了《儒林外史》，那么，他当时使用的是哪种什么样的方言呢？

我们从吴敬梓的生活经历中，可以推测一个大概。

十四岁之前，吴敬梓在全椒襄河畔曾祖父的“探花第”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十四岁时随嗣父赴赣榆，以后的九年中，后五年虽往返于大江南北，但主要是在全椒度过的；前四年的行踪尚不清楚，有人以为多在赣榆，也有人认为主要生活在全椒。二十三岁重返全椒，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三十三岁。这十年中只是偶尔探亲访友，才离开全椒。如果我们推测吴敬梓 1735 年左右创作《儒林外史》无误，那么，三十岁前后，吴敬梓近 90% 的岁月是在全椒度过的。离开全椒的几年，也并没有完全割断与全椒的联系：他身边的亲友是全椒人，即使身在异地，也应仍生活在全椒话的包围里；他不断地回去探视亲人，经常回到自己熟悉的语言环境中去。吴敬梓壮年之前的简单生活经历，使我们无法想象吴敬梓使用的语言，不是一种读书人使用的全椒话。

所以，从我们目前对吴敬梓家世、身世的了解，可以推测，吴敬梓大约是在 1735 年前后，创作了《儒林外史》，而《儒林外史》所使用的语言，应该带有明显的全椒方言色彩。

全椒^⑬是安徽省中东部的一个县（参见本书末附地图），位于安徽省江淮丘陵区的东部，江淮分水岭的南侧。

全椒历史悠久，西汉开始置县，县名相传是由古国名演变而来。根据传说，古代高阳氏在椒陵山（又称覆釜山，今在城内）建立古椒国。春秋时为楚国的椒邑，楚灵王时曾分封给大夫伍举作采邑，古人以邑为氏，故伍举又称椒举，其子伍鸣又称椒鸣。后来成为全氏居住之地，所以汉代在椒邑置县设治，为其定名为全椒。汉代以后，全椒县几经兴废，到明初，废全椒县，并入滁州。明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又复为县，延续至今。

全椒县治设在襄河镇，其地依山靠水，地理环境优越。汉代设治之后，人口不断增多，明清时已是规模颇具的城镇。全椒地处南京与合肥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历来商业贸易繁荣。明清两代徽、闽、苏三地客商云集，本地商人也在清末崛起，在当时兴旺繁荣的商贸活动中，每年仅从水路运出的粮食就有十万石以上。

清代以后，全椒社会生活大体稳定，从有关记载看，最主要的社会动荡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太平军攻入全椒，曾与清军发生激战；两年以后，驻守全椒的太平军守将杜宜魁等叛变，同年及次年，太平军两次攻打全椒，但均未能攻下。

全椒方言属北方官话区的下江官话；在安徽方言区内，属（合）肥芜（湖）片。对全椒方言目前尚无专门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方言志出版。《全椒县志·方言》是一个对全椒方言的简单介绍，内容主要是关于语音方面的。从该书的介绍看，全椒方言的语音（以县城为代表），声母有 22 个，韵母 43 个（包括 11 个入声韵），声调 5 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主要特点是：

（一）与普通话相比，声母多一个 V，凡普通话合口呼零声母字，在全椒方言中都带有 V 声母。

（二）分尖、团音（中古音精组和见晓组在今细音前有区别），如：“精≠经”“全≠权”“息≠吸”“修≠休”。

（三）声母边音 l 和鼻音 n 在实际读音中不分，如：“努=路”“脑=老”“泥=梨”“男=蓝”。

（四）前后鼻音不分，如：“安=肮”“关=光”“根=庚”“金=经”。

（五）没有卷舌韵母，“儿、耳”都读 ei。

由于“方言”只是《全椒县志》中的一章，所占篇幅很小，所以，除语音外，词汇部分收词有限，语法则完全没有。倒是因为吴敬梓是全椒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名人，作者从《儒林外史》中选取了以下 59 个作品里出现过的“方言词汇”，作为附录收进了这一章里：

1. 疲软
2. 久矣
3. 只得
4. 年里头

5. 舞起来	6. 捋	7. 落后	8. 停当
9. 考校	10. 打瓦	11. 多	12. 号啕痛
13. 毕竟	14. 乞乞缩缩	15. 厦披子	16. 烂忠厚
17. 时	18. 蹤	19. 局	20. 小老
21. 蒲窝子	22. 弄送	23. 齐铺铺	24. 本丧
25. 费	26. 焦怎的	27. 张见	28. 一声不倒一声
29. 序	30. 一会儿	31. 胡三	32. 开门钱
33. 广大	34. 橫竖	35. 疑惑	36. 杀我的巧
37. 肯信	38. 窝子	39. 盘缠	40. 不得错
41. 大呆	42. 搭嘴	43. 的实	44. 一点水一个泡
45. 傲头傲脑	46. 一转	47. 虽则	48. 喇伙
49. 疙瘩	50. 倒熟	51. 荒春头上	52. 做张做致
53. 人参果	54. 痰气	55. 脚鱼	56. 韬刀
57. 定当	58. 吵窝子	59. 凿凿	

全椒人很以吴敬梓为傲,他们把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看作是为自己家乡增添光彩的事情,也十分肯定地认为吴敬梓生长在全椒,他使用的是全椒方言。而这其中明显的证据,除了吴敬梓世居全椒,他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以外,就是在今天的全椒人看来,《儒林外史》中使用了许多全椒方言所特有的“方言土语”。

全椒人的这些想法应该是颇有道理的。当我们研究《儒林外史》的语言,探讨其方言特色时,可以依循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是考察吴敬梓的生活经历,一是探索《儒林外史》使用的语言究竟和哪一种现代汉语方言更接近。吴敬梓的生活经历在以上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他壮年之前的生活大体上是以全椒为中心,在全椒度过了他 54 年生涯的一大半。《儒林外史》使用的语言与哪一种现代汉语方言更接近,则是本书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由于体裁的关系,书中韵文很少,不利于通过归纳用韵,找出作者语言的语音特征。同时,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找到小到一个县的范围的方言特征,这就要求这些特征既要在地域上是排他的,又要求在历时中是连续的。这样的材料应该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它或许存在，但是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所以，很难期望在语音方面找到有力的证据。语法规律性强，在判断作品的写作年代方面是最好的材料，可是当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作品的方言特征时，语法方面的特征虽有帮助，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词汇从表面上看是最杂乱无序、难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是大家研究某一作品的方言特征时，却是最常用的证据，利用词汇证明作品作者的文章大概遍及所有考证作者的课题。^⑩既然有这么多人把着眼点集中在词汇方面，这其中一定有其必然的道理。只是，目前对从词汇来研究作品的方言或个人特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还没有一个深入的思考。

从今天对吴敬梓生活经历的了解，大家有理由推测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使用的是全椒方言，而全椒人也认为吴敬梓使用的是他们的家乡话。在本书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设计一种方法，通过对《儒林外史》词汇系统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注释：

- ① 参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② 参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 ④ 同注③。
- ⑤ 顾云《钵山志》，卷四。
- ⑥ 程晋芳《怀人诗》。
- ⑦ 同注③。
- ⑧ 参阅《胡适文存》2册4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 ⑨ 上海出版公司，1955。
- ⑩ 转引自《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 ⑪ 引自孟醒仁、孟凡经《吴敬梓评传》，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⑫ 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⑬ 以下有关全椒县的材料，均转引自《全椒县志》，黄山书社，1988。
- ⑭ 参阅2.1, 4.1。

第二章 《儒林外史》词汇系统的方言色彩(上)：调查方法

2.1 问题的回顾：明清小说的作者和方言

有人说，没有方言就没有明清小说。这虽然是一种颇为偏激的见解，但是在其偏颇的背后，也反映出明清小说的一种特色。

方言古已有之，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作品反映方言的程度（或说是对方言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明代以前，历代的诗词歌赋直到元代的杂剧，受文体限制，在一个较短的篇幅之内，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也就不需要大量地使用方言口语；韵文部分受声韵的限制，用韵以《广韵》为标准，由于常常事关功名，自然不可违逆，方言也就不敢轻易使用。明代以后，白话小说的出现，使方言在文献中有了用武之地。作品要直接反映社会、反映生活，从达官贵人到市井小民、倡优走卒，在白话小说中都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语行为，都要真实贴切、细致入微地描写出来，这时，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方言口语就不能不广泛、大量地使用了。看一看明清以来著名的白话小说，《水浒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有山东方言的色彩；《西游记》、《儒林外史》使用了江淮方言；《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据说是用北京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何典》则被认为是用的吴语。虽不能说没有方言就没有明清小说，但却真是没有明清小说中没有方言。

赋诗撰文是中国文人的雅事，到明清小说写到下九流的生活琐事时，早已背离了“雅”的初衷；读书本来是与治国平天下、与科举功名连在一起的，但到读书人写小说时，或者已是穷困潦倒，生活难以维继；或者久困屋场，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已如南柯一梦，面对的只是辛酸无奈，满腹的不平和牢骚，要一吐而后快。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之下，从兰陵笑笑生到西周生，五花八门的笔名隐去了作者的真实

姓名；《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不知有多少作品不知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有些穷困潦倒的作者们有时甚至还来不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就离开了人世，于是不知有多少作品，像《红楼梦》那样，前后由不同的作者分别完成。成书后的小说，抄写、流传，偶然和意外时有发生，缺损遗失之后，只能由一些有兴趣于此的人去补足，于是又有了像《金瓶梅》那样，部分章节由他人补足的作品。凡此种种，使得作者变成了困扰着明清白话小说研究的问题之一。如何确定这些数百年前的作品的作者，从内容、思想到史实、自然地理，研究的着眼点丰富多采。而小说的语言，更是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一个方面。当然，除少数纯粹以方言创作的小说之外，绝大部分作品的语言基本上是当时流行的“官话”。但也正如以上我们曾指出的，小说的体裁使之接近生活，要求它生动、如实地反映生活，这就使得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去使用他所熟悉的日常口语，会使作品中的语言在基本使用官话的同时，带上作者的方言色彩。就是这样方言才成为明清小说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为我们研究明清小说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能确定某一作品的方言特征，确定一部作品语言受到哪一种方言的影响，然后再去考虑作者问题，这会使问题的范围大大缩小，也就使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同样，对于语言研究，明清白话小说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它不仅能使我们知道某一时期“官话”的情况，还可以通过一部作品使用的特殊词汇、语法等，了解某一时期的某种方言。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弄清作品的写作时代与作者，是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

从方言去研究作者问题，从作者去看方言问题，论证的思路不能说不科学，找到的论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结论却远不像预期的那样理想。

《金瓶梅》使用的方言和作者问题，是这方面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例。

远在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就指出：《金瓶梅》“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穿。”这是第一次提出《金瓶梅》中的方